



評論
tb

七十七載復興路 築基育人譜新篇



議事
論事

今年國慶，意義尤其非凡。對國家而言，是「十五五」規劃開局之年；對香港而言，是特區政府首次制定落實香港五年規劃的關鍵階段。五年規劃與施政報告，兩份文件一脈相承，既是香港主動對接國家戰略的藍圖，也是推動規劃落地見效的行動綱領。

如果說，國慶回答的是「國家從哪裏來」，五年規劃和施政報告回答的是「香港往哪裏去」，那麼工程界要回答的，就是「我們如何築牢根基」。三條線索，其實是一條主線：銘記歷史，才能看清前路；主動規劃，才能融入大局；專業落實，才能不負時代。

一、國家是根：讀懂國家從哪裏來

國慶不是普通假期，而是國家新生、民族命運轉折的紀念。1949年新中國成立，標誌着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回望近代史，國家走過百年屈辱，經歷無數先賢奮鬥犧牲，數代領導人帶領國家改革開放，才迎來今日繁榮

穩定、國泰民安。認識這段歷史，明白國慶真正意義，也才能體會到有國才有家，國家安全與社會穩定的重要。

對香港而言，加強市民特別是年輕人對國家近代史的認識，是國民教育的重要一環。只有讀懂歷史，認識國家曾經走過的苦難，才能自覺認同國家；只有認同國家，才能自覺維護國家安全。建議持續全面推動國民教育，以更好維護國家安全，期望特區政府不斷深化國民教育體系，將國家歷史、國家安全與價值觀教育有機結合，讓愛國情懷在香港社會扎根。

今天我們在慶祝國慶，不應只是慶祝一個節日，更重要是重溫先輩們奮發圖強的初心，從而思考自己如何為國家安全和發展貢獻一分力。

而工程界正是一向全力為國家發展、為國家安全服務的中堅。今天，香港的工程技術、基建水平已躋身世界前列。港珠澳大橋、中環及灣仔繞道，還有正全速建設的北部都會區……我們有能力建設任何規模的工程。但基建的意義，遠不止技術上的完成。唯有讓每一項工程都能真正服

務人民、經得起時間檢驗，才能不負歷史、不負時代。

二、規劃是路：把歷史初心化為行動綱領

讀懂歷史，不是為了停留在過去，而是為了看清前路。如果說國慶讓我們不忘「為什麼出發」，那麼五年規劃和施政報告，就是告訴我們「今天往哪裏走」。五年規劃為香港中長期發展擘畫藍圖，對工程界而言，回應這份藍圖，是把專業所長轉化為落實力量。具體而言，就是建得安全、建得及時、建得可持續。

第一，建得安全。安全是工程的底線，也是城市運行的底線。工程界必須從設計、施工、監督、品質保證到維護修養，層層把關，確保結構安全、工地安全，任何環節都不能鬆懈。

與此同時，城市基建的韌性及安全同樣不能忽視。現時香港有不少基建設施已建成逾半世紀，需作深層次的檢測、維護或更換。施政報告提出五年內更換或修復350公里高齡水管，構建「智慧水網閉環管理鏈條」，以人工智能進行預測性維護，

方向正確。建議有關部門推動「五年老舊基建修復重建計劃」，全面排查、分類處理高齡橋樑、隧道、水管等基建設施，做到「圖之於未萌，慮之於未有」，讓市民用得安心、用得放心。

第二，建得及時。過去香港基建規劃往往滯後於人口遷入，新發展區居民入伙後才補建交通，生活質素大受影響。五年規劃明確提出「堅持基建先行發展」，是城市發展模式的根本轉變。基建走在需求之前，城市才能有序成長，市民才能及早受惠。

第三，建得可持續。香港建造業長期面對成本高企、審批繁複的雙重壓力。建議審批部門從「監管者」轉為同時擔當「促進者」，簡化審批程序，推動採用創新物料、機械、工藝和技術。唯有降低成本、提升效率、擁抱創新，香港工程才能在區域競爭中保持優勢，更好服務國家和香港所需。

三、工程是基：築基與育人相通
基建與國民教育，看似兩個範疇，實則相通。如果年輕人只知道國家建設了什

麼，卻不理解國家為何要建設、為誰而建設，國民教育就只停留在表面。同樣，如果工程界只埋頭施工，不解釋每一項工程背後的國家及香港發展邏輯，我們也難以讓社會特別是青年一代看清香港與國家的關係。

筆者認為，工程界可做更多，例如開放工地、舉辦講座、提供實習，讓青年從一條橋、一條管道、一座車站中，看見國家及香港發展與自身未來。作為工程界的一分子，筆者亦不斷在思考怎樣在崗位上更好服務社會，服務專業，讓工程專業健康可持續發展。

銘記歷史，是為了更好地走向未來；築基育人，是為了讓復興的根基更加牢固。國家是根，規劃是路，工程是基。工程界願當好「落實者」，以專業所長，服務香港所需，對接國家所需，為這座城市的下一個5年、下一個77年，築牢根基。今天我們築好的每一條道路、每一條管道、每一座橋樑，都是寫給下一個77年的歷史答案。祝願祖國繁榮昌盛，香港再創輝煌。
立法會議員（工程界）、經民聯執委

以前海為支點建設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



港事
港心

特區政府9月16日公布香港首個五年規劃及新一份施政報告。五年規劃是「頂層藍圖」，施政報告是「年度施工圖」，共同勾勒未來五年發展路徑。規劃明確支持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發揮先行先試功能；支持兩地探索科技與金融協同發展；支持香港現代服務業立足，前海拓展內地市場；推進深港在知識產權跨境合作；擴大以前海為香港建築工程管理制度試點平台；繼續深化法律服務、仲裁調解等專業的精準對接與制度化合作；支持香港青年把握前海深港青年夢工場機遇；透過前海聯合交易中心發展大豆離岸現貨市場；強化香港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功能；支持在建設深港數據跨境安全便捷通道。這些舉措構成前海先行先試的制度生態，更好鞏固提升香港獨特優勢，支持香港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

規劃將建設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列為重點之一，強調文體旅融合，打造人文灣區，促進粵港澳居民「心聯通」。筆者作為深港合作一線工作者，認同規劃提出：加強本地與內地藝術機構、博物館、劇團及影視單位協作，支持聯合創作、巡迴演展及境外展演；加強與大灣區城市及旅遊業界合作，推出「一程多站」，善用大灣區體育場地資源，提升訓練和辦賽效能。

事實上，建設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應置於粵港澳大灣區格局謀劃，而前海可發揮支持香港的獨特作用。以下三個深港文體旅協助案例有借鑒意義。

案例一：前海冰雪世界。2025年開業，彌補香港無雪場短板。中國香港滑雪總會獲引進國際冰雪賽事通道，發揮香港內聯外通的獨特作用，香港運動員可就近訓練和比賽；

香港的航空及跨境客運獲穩定客流；港澳旅行社新增「冰雪+」產品，實現「一程多站」。

案例二：前海文化藝術品保稅展示交易。2025年3月揭牌，8月完成全省首場保稅拍賣，保稅拍品佔五成、成交率76%，啟用深圳文化藝術品保稅「第一倉」。機制實現「區內存放、區外展示」，暫緩稅費，降低香港藝術品進入內地成本，為畫廊、拍賣行和藝術家提供開拓內地市場跳板，鞏固香港全球三大藝術品交易中心地位。

案例三：香港管弦樂團前海首演。2026年1月3日，港樂新年音樂會首度亮相前海濱海藝術中心，成為海關總署「新18條」便利深港文藝交流首單，樂器「零延時」通關。香港文藝團體北上門檻大降，可常態化巡演，觸達大灣區高消費觀眾，約20%為香港跨境觀眾，並推動「一簽多行」便利外籍樂手往來，強化港樂國際化優勢。

三例共同印證，前海以制度創新降低香港文體旅團體進入內地灣區市場的成本，擴大在內地市場的影響力，強化香港的內聯外通能力。冰雪世界打通「體育+旅遊」，保稅交易打通「文化+貿易」，港樂首演推動「文化+通關」。

總結而言，香港建設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前海亦可成為戰略支點。前海冰雪世界、文化藝術品保稅展示交易和港樂在前海首演三例，分別以「文體旅+」打通鏈條，既強化香港內聯外通和國際化優勢，也促進聯合創作、巡迴演展與「一程多站」。由此，香港可在粵港澳大灣區格局中打造人文灣區、促進居民「心聯通」，把盛事流量轉化為產業增量，鞏固全球藝術品交易中心地位，走出一條協同前海、輻射灣區、聯通世界的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建設路徑。

前海管理局首席港澳聯絡專家

余澤韋

智庫
說

隨着物聯網、人工智能及大數據技術的深度應用，全球海事行業正經歷一場前所未有的數字化與智慧化變革。近年來，我國高度重視航運領域的科技賦能，出台多項政策，從船舶建造、港口運營到智慧航道，全方位推動航運業向全流程智能化跨越。

深刻的數字化轉型也徹底重塑了海事風險的格局。隨着船舶高度互聯、港口自動化調度系統普及以及跨境口岸數據共享，航運企業與港口經營人暴露在外、可能遭受網絡攻擊的風險節點呈現增長趨勢。

國際社會早已對此形成廣泛共識。早在2017年，國際海事組織發布了《海上網絡風險管理指南》（MSC-FAL.1/Circ.3），標誌着網絡風險被正式納入全球海事安全管理體系。海事網絡安全公司CYTUR發布的《2026年海運網絡威脅白皮書》顯示，2025年全球海運網絡安全事件同比激增了103%。在新興AI技術加速滲透交通運輸的大背景下，海事網絡安全威脅正日趨嚴峻並持續向深層次演化。

全面提升網絡防護能力

航運網絡風險早已超越了單純的技術故障或財務損失範疇，演變為直接威脅國家經濟命脈與地緣政治安全的隱患。歷史上屢次發生的重大攻擊事件，已凸顯出海事網絡癱瘓可能引發的毀滅性後果。例如，2017年「NotPetya」擦除式惡意軟件（wiper malware）攻擊集裝箱巨頭馬士基（A.P. Moller-Maersk），迫使馬士基在全球範圍內重構其整個信息技術基礎設施，業務出現大規模中斷，直接經濟損失高

達2.5億至3億美元，而給全球供應鏈延誤帶來的間接損失難以估計。而在港口作業端，2023年7月日本最大集裝箱港口名古屋遭邁勒索軟件攻擊，導致集裝箱出入關門及卡車調度系統全面中斷達兩天半。波羅的海國際航運公會（BIMCO）呼籲全球船東將海事網絡風險提升至地緣政治風險的高度加以審視。

作為全球第一貨物貿易大國，我國商船運力的穩定供應以及核心港口的順暢運轉，是保障國家安全與供應鏈韌性的根本基石。

首先，香港是全球第五大船舶註冊地，大量中資運力懸掛中國香港船旗。其次，香港擁有全球領先的船舶管理服務，眾多內地大型央國企航運企業選擇在港設立管理平台或採用香港船舶管理公司的服務。再者，在港口領域，中資企業以合資方式深度參與香港集裝箱碼頭的建設與運營。此外，中資金融租賃機構佔據全球船舶融資市場12%以上的份額，大量業務依託香港平台開展。最後，內地航運企業日益青睞「香港海運戰險保險池」，以降低對西方市場的依賴。

若香港在船舶註冊、航運管理、碼頭運營及海運金融領域的網絡安全防護力度不足，不僅會增加掛旗船舶與管理端遭遇網絡攻擊、勒索及港口扣留的風險，損害其國際註冊聲譽，還將直接威脅粵港澳大灣區供應鏈與戰略物資運輸安全，並可能引發國有金融資產損毀與系統性風險，亟需全面提升防護能力並豐富海運戰險的覆蓋範圍。

在此背景下，香港作為國際航運中心建設航運網絡安全，不僅是提升香港本地金融、港口與海事服務業抗風險能

力的切實舉措，更是維護國家海運物流鏈安全、應對複雜外部地緣政治挑戰的必然戰略選擇。

與航運網絡安全威脅日益上升的態勢相比，香港本地的網絡安全防禦體系建設相對滯後，安全事件頻發。公開數據顯示，2024年香港網絡安全事故按年激增108%，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通報的資料外洩及黑客入侵事件均呈現大幅上升趨勢。

積極借鑒內地網安標準

相比之下，內地已建立起較為完備的航運網絡安全法律法規與標準體系和國際標準制定經驗。從《網絡安全法》《數據安全法》等基礎性法律，到《交通運輸數據安全管理辦法》《公路水路關鍵信息基礎設施安全保護管理辦法》等具體措施，均奠定了堅實的制度根基。在船舶標準領域，中國船級社早在2017年就推出了《船舶網絡系統要求及安全評估指南》。在國際層面，我國於2024年聯合多國主導制定的智能航運國際標準《船載網絡安全風險評估》正式發布，標誌着我國在國際航運網絡安全標準制定領域具備了重要話語權。

深化兩地合作具有顯著的互補性與戰略意義。通過將內地成熟的網安標準體系、技術防護能力以及風險評估機制引入香港，不僅能夠有效填補香港海事網安的制度與技術空白，提升在港中資企業及核心基礎設施的防禦能力，更能充分依託香港作為世界頂級船舶註冊處與國際海事中心的獨特地位，推動中國海事網絡安全標準的國際化應用，全面增強我國在全球海事治理中的影響力和話語權。

團結香港基金研究員

西方制度模式衰敗的原因何在？



國際
關係

美國即將舉行中期選舉，緊接着2027年歐洲五大國法、德、意、西、波也將舉行選舉，算是西方一個不小的選舉年。過去這往往是西方制度自我展示的時刻。然而今天的西方制度模式已經深陷困境：經濟停滯、債台高築、政治極化、極右民粹主義強勢崛起、社會嚴重對立和分裂，可謂政治、經濟、社會危機交織而至。根據瑞典哥德堡大學V-DEM研究所統計，2025年全球非西方政體超過西方政體，是20年來首次。全球只有28%的人口生活在西方體制。同時，全球近四分之一的國家正經歷西方的民主倒退，特別是美國自由民主指數一年內暴跌24%，全球排名從第20位跌至第51位。

西方政治制度問題的根源學界都有深刻解讀。比如由於全球化、自動化和金融化，致使西方中產階級萎縮已低於50%，社會保持穩定和理性的社會結構消失，這也是極端政治勢力崛起和西方社會內部再難以妥協的原因。

然而任何制度都是人設計的，也是由人運作的，真正起作用的還是人性。人性

善惡皆存，制度設計一定要考慮到人性本身。西方恰恰在這一點上犯了結構性錯誤：其政治制度要麼違反人性，要麼應該抑制的人性缺點卻通過制度獲得放大。

我們先看政治人物。從最基本的政治倫理和保障國家長治久安來講，一個政黨和政治人物不管什麼立場，當選後都應該從國家整體利益出發，要代表全民而不仅仅是自己的支持者，尤其是要考慮國家的長遠未來，須有前人栽樹後人乘涼的胸懷。但在西方政治制度設計下，它沒有從人性角度考慮國家、政黨和個人利益的關係，由此導致相反的結果。

西方是由定期的選舉更替政黨和政治人物，一個政黨和一個政治人物任期四年或八年。從人性角度講，第一，他們想的只能是自己任期內的事情。而且就算他對未來進行規劃，只要他或他的政黨不執政，同樣也會被廢除。所以他也不可能前人栽樹後人乘涼。特朗普第一次執政時就廢除了民主黨時期的多數政策，等到拜登上台自然又還自身。

第二，政治人物的利益排序只能是個人大於政黨，政黨大於國家。執政黨、在

野黨無不如此。

美國政府頻繁關門事件就是典型的例子。提高債務上限本是一個正常的技術性操作，誰也不能讓美國政府違約。但卻一再演變成政黨利益博弈，不惜導致政府關門，最長的一次竟高達43天。後果是經濟受到嚴重影響、國家形象受到嚴重損害、美國主權信用降級。最令人無法接受的是，這和立場信仰無關，是純粹的利益層面的黨爭：只要是在野黨就一定反對，只要是成為執政黨就一定支持。

在野黨的設計本意是監督執政黨，少犯錯誤，能夠更好地治理國家。可是從人性角度講，如果這樣在野黨就永遠難以成為執政黨。只有為反對而反對，想盡一切辦法破壞執政黨的治理讓其不得人心下台才是唯一理性的選擇。於是政府關門才是合理的邏輯。這也是為什麼美國為代表的體制變成「否決體制」，在野黨如果執政，就把問題的責任推卸給前任，下一次政黨輪替又重演一遍。

議會制國家時常組建聯合政府，但如果一個黨或者政治人物出於利益需要就會退出政府使其垮台。2013年9月，意大利前總理貝盧斯科尼為甩鍋自己因稅務欺詐

罪失去議員資格，幕後策劃了本黨5名部長辭職，意圖迫使剛成立五個月的政府倒台。後來沒有成功也是因為他的指定接班人、時任副總理和內政部長阿爾法諾，不願失去自己的職位。如果說貝盧斯科尼是個人利益大於國家利益，阿爾法諾則是個人利益大於政黨利益。

第三，正如政黨一詞的詞根意涵是「部分」一樣，在西方制度下政黨只代表自己的支持者，而不會是全體。比如美國民主黨傳統上被視為工薪階層的左派政黨，共和黨則被視為大資本家的右派政黨。每個黨都要鞏固和回報自己的支持者。這就是為什麼左派上來就要給工薪階層增加福利，右派上來就要給財團減稅。但為了獲得選票，左派加福利卻不敢增稅，右派減稅卻不敢減福利。最終國家債台高築。今年8月，經濟總量只有30萬億的美國，其政府債務超過40萬億美元。歐洲、日本也是如此。

下面再看民眾。在西方制度設計下，民眾擁有決定誰是國家領導人的巨大權力。但一方面這種權力沒有任何制約，另一方面民眾既不具備足夠的專業知識，也不會受到嚴格的專

業訓練，既不會從宏觀和長遠來看待問題，更不會為了整體利益犧牲自己的利益，當然也更不會關注國際關係。他們選擇政治人物的唯一標準就是看自己的生活水平是否提高。

然而自私自己、好逸惡勞、貪得無厭、目光短淺、急功近利等都是人性的組成部分，應該受到合理的抑制，但由於政治人物選舉時、執政時競相迎合，反為人性之惡提供了自由的釋放空間，人性缺陷在西方制度下得到了極大的放大。比如面對地球資源的有限性和龐大人口的壓力，美國卻能以6%的人口消耗了世界35%的能源，無人敢於改變。就是人性之惡加制度的結果。

總之，西方的制度模式既違反人性又對人性負面加以迎合，這使得制度本身建立在反人性的基礎之上。正如政治學者福山所說：「我認為任何政治理論都必須是一種基於人性的理論，因為在某些方面違反人性的政治體制是無法維繫的。」所以西方政治制度從冷戰後的高光時刻迅速跌落實乃必然。

旅法政治學者、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